

上海门檻

【袁念琪 ● 著】

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

上海人的门檻

就是上海人对这门人生艺术

较为充分的利用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门檻

【袁念琪●著】

I267.1
Y905



上海文化出版社

I267.1
Y9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门槛 / 袁念琪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40 - 276 - 3

I. 上... II. 袁... III. 文化史—上海市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220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赵光敏

封面设计

许 菲

书名

上海门槛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3 1/3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276 - 3/I · 527

定价

25.00 元

敬告: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5410805

序

上海人的门槛

一说起上海人的“门槛”，绝对是乒乒响的；而且这名气早已是走出了上海，并且成为上海人的一个符号。

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一些外省人看来，好像只要你是上海人，那就是门槛贼精的。殊不知，在上海人的日常用语里，还有“戆大”、“阿木灵”、“寿头”和“阿曲死”等一系列与“门槛精”相对的反义词。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既然是有了这么一干的词汇，总是要戴在某些活生生的脑袋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上海人的门槛？在七十二年前问世上海滩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里，对于“门槛”是如此诠释：“门槛原来是诀窍的解释。所谓‘老门槛’、‘门槛精’的朋友，就是老于事故，不易受人之骗。”

时至今日，这“门槛”的内涵早已今非昔比，有了多元的发展。在某些外省人和本地人的眼里，它甚至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而“老门槛”和“门槛精”，遂成了一种嘲讽和讥笑。有一阵子，一句“精明不高明”，更成了看待上海人“门槛”的一副有色眼镜。

门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上海人头脑里所固有的。事实上，上海人的一些门槛，其他地方的人也是有的。它是具有共性的生活经验、做人的本领。

当然，有些门槛倒是上海人所独有的。譬如，上海人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其实就是因长期生活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中，比较善于把资源利用到

极致,而且是不怨天不怨地,积极开动脑筋,与时俱进;用自己的双手,把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又如,上海人做事比较讲规则,这是这座城市多年浸淫现代文明和海外先进文化的结果。人们不是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它还滋养着这一方人的思想。

文学大师萧伯纳说得好,“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上海人的门槛,就是上海人对这门人生艺术较为充分的运用和发挥。可以说,上海人的门槛是多少代上海人生活的积累,是上海人对日常生活经济学的匠心独运和经验总结。从公用厨房里的电灯泡、半两粮票到婚礼地毯上的经济账,从菜场买排骨到家居装修,它是上海人经济生活的行为特征之一,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元素,同时也影响了上海人的性格特点,自然也不免出现了一些误解和误读……

当年闹“长毛”,先祖从南京跑到上海;光阴似箭,自己在上海也生活了四十多年。耳闻目睹、日积月累了对上海人门槛的观察和感悟,套用一句老话:“门槛”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门槛”是万万不能的。

昨天的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地方,今天则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明天又将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城市之一。上海人的“门槛”——对日常生活的经济感悟和经验总结正与时俱进,有趣而又意味。

上海人的“门槛”是天地广阔,大有作为。我想,这于己于人,于国于家,都是有益有利的。

袁念琪

2008年初夏·上海



屋里厢门槛

- 2/ 门当户对去“投胎”
- 6/ 敲定的背后
- 10/ “汤司令”，喝汤么
- 16/ “夫妻老婆店”店规
- 20/ 生，还是不生
- 24/ 穷养·富养
- 27/ 家家有本教育经
- 31/ 退休计划超前排
- 34/ 贴进贴出有噱头

开门见门槛

- 40/ 砖头·稻草结·破篮头
- 45/ 灶披间里的电灯泡
- 50/ 半两粮票
- 54/ 游戏之戏
- 59/ 咪唏咪唏炒咸菜
- 64/ 辰光在路上
- 68/ 食堂是张牌
- 73/ 看得到的待遇

馋唠胚门槛

- 78/ 新年的口彩
- 82/ 三十不做 四十不发
- 87/ 肉就是排骨 排骨就是肉
- 91/ 泡饭·浇头·厚粥
- 96/ 盆菜·本帮菜
- 102/ “保身架”·保本钱
- 107/ 盐金枣·土豆片

扎合型门檻

- 114/ 阿拉送礼更有礼
118/ 面子多少价钿一斤
123/ 螺蛳壳里做道场
128/ 淘“镗货” 拓便宜
134/ 爱“大卡” 喜“钱版”
139/ 素质老灵呃
144/ 面孔为啥这样红
148/ 闲话撑世面

- 154/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159/ 给点合理就灿烂
164/ 扒辰光里的分
169/ 新闻中有黄金屋
173/ 做个网商很适意
178/ 一生要有两套房
182/ 升值的碎木片
185/ 出入当铺笑嘻嘻

扒分门檻

- 192/ 先投机 再倒把
195/ 报销单
20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205/ “黄牛” 还在走
210/ 银行保管箱
214/ 立此存照
218/ 摇奖机
222/ 昨天的礼券
226/ 促销宣传品

老底子门檻

屋里闲人档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件人生的大事上，它肯定是不**会袖手旁观**，默默无闻，无疑是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门当户对去“投胎”

我的一个女同事说：结婚对于女人，就是第二次投胎。其实，这个比喻对于男生来说，也同样是贴切的。

第二次投胎与第一次的最大不同，就是你本人是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你不仅是具有选择的权利，还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投胎——失败——再投胎——再失败——再投胎——直到投到满意如愿为止。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和说法，把这个“投胎”看作是个投资。不是说，结婚就是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么。凡是投资，哪个也不想落空，二是希望投入少而产出大。抱有这样想法的男女双方，目标直指双赢。

投资就要算账。对于算账，人们常说是既要算政治账，又要算经济账。在当今结婚的择偶上，政治账虽然已经不再问姓社还是姓资、是“黑五类”“臭老九”还是三代工人贫农根正苗红，可还是要看人品看素质看学养，政治面貌有时还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参考分和附加分。但是，结婚是要过日子的；人生在世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哪个不想食得有滋有味。因而，一算





起经济账来,难免就要算得多些、细些、精些。

不管你是第几次投胎,投胎的基本原则就是:高不攀低不就,门当户对乐悠悠。因为无论是高攀还是低就,实际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不平等;对高者是一种倒贴,对低者则是一种透支。对于婚姻来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平等,都可能是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就是产生裂缝的一处内伤。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都是不太坚固和不太长久的。

《相约星期六》是上海电视台一档开办多年且极有影响的节目,专为青年男女的婚姻牵线搭桥,门当户对也是其匹配的一项原则。比如,它推出过高学历专场。能下这个场子的,都是高学历者,需要出示硕士以上的派司才能换得一张入场券。节目的编导们是绝不会混入文盲或是只有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嘉宾。

门当户对就是男女双方要相匹配。有道是扫帚配簸箕,匹配是有着一系列具体内容的。譬如在年龄上要相当。一般是女不能倒大,当然也有“浦东人喜欢大娘子”。还有高矮得当,有男1米80出头,女的却不到1米60,两人一牵手,男的就像拎了只热水瓶。甚至还有籍贯方面的考虑:南方人最好找南方人,江北人不考虑,宁波阿婆难服侍等等。此外,还有学历、家庭、住房和居住地段等要求。

找对象讲门当户对,其实就是在寻找配偶的最优和最佳组合,途径不外乎是分类配对和相近配对。能门当户对最好,退而求其次是相近。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相爱的男女,他们各自的家庭、学历、经济状况等并不是门当户对的。就是门当户对,也就总体而言,不会平等得如天平两端。为使不平等变得平等起来,为缩小两者间的距离,那就要进行互补。

男女双方中的一方,或者是双方,都要在某些方面做互补的工作,在改变中提升自己,实现门当户对。好比踢足球从甲 B 打入了中超,你才能交上中超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事例,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能达到门当户对。

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在上海采访过一对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据说早在 20 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门当户对讲的是般配,但这个般配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使天平两端达到平衡,从而结成夫妇。它的积极意义,不仅让婚姻稳定,而且在这种不断地从低向高的跳跃和与时俱进之中,人才有进步,经济和社会才有发展。也有人说门当户对的世俗,甚至是庸俗;但要看到,高调只能是画饼充饥,跛脚就埋下了倾覆的危险。

国外的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为什么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却相似地注重财富、教育程度及其他特征,以此来选择配偶。很显然,造成这一连串差异,也就是造成门不当户不对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经济。经济决定你所受的文化教育、见识经历、居住条件、衣着打扮、欣赏口味和消费方式等,一句话:经济决定你走上婚恋舞台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然而,结婚之后还要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影响。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它肯定是不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是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敲定的背后

上海人把男女之间的找朋友搞对象,叫做谈“敲定”。

什么是“敲定”?它起源于拍卖行。上海早在1872年(清朝同治十一年)就有了中国第一家拍卖行,是英国人鲁意师摩开设在江西路45号的鲁意师摩洋行。拍卖用槌,一槌敲下去就定局,那就是敲定。

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上海人就将这经济术语借用于男女恋爱。后来,发展到“敲定”竟成了未婚妻未婚夫的代名词。听见有人喊,“阿六头,依个‘敲定’来了”,那就是说阿六头的女朋友来了。

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当教师。学校有中学生早恋谈“敲定”,同办公室的钱老师一语中的:啥个“敲定”?!“敲定”是十“敲”九不“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晚总是要“敲定”的。就像拍卖行里的敲定那样,牵动你手中槌子敲下去的,是你心里的价格底线。同样,男女间的“敲定”也是有标准的。但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讲门当户对,从个人的身高、相貌、学历、收入到家庭、籍贯、住地等。总的原则就



是相配,跛脚就埋下了倾覆的危险,就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倘若已敲定的男女间有脚高脚低的差异,那是因为互补做了填平;虽不能达到一肩平,却能被双方接受。

另一方面是要讲究经济效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他那本被奉为经济学经典之作的《家庭论》中认为: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活动;目的是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蕴涵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因此都是可以运用经济学加以分析、研究和说明的;“敲定”也不例外。

男生女生在“敲定”中,由爱生情到最后真正要拍板敲定,那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两人是成立一个临时的互助组,还是建立长久的共同体。

以贝克尔教授的观点来看: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是继续寻找配偶所负担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促使人们做出结婚决策的那些变量的重大变化,将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做出的抉择。

当一加一大于一,这个“一”和那个“一”才会敲定,结婚组合。用我们平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人多力量大”。其实,人多未必就力量大,人多力量大是有前提条件的。

法国心理学家林格尔曼做过一个实验。分别以一人、两人、三人一组直到八人一组,来进行拔河比赛。我们就看两人组,因为其他各组实验结果相同。实验用测力机测量和记录了用力情况:单人拔河平均用力为 63 公斤,两人的平均叠加计算应为 126 公斤,但实际测出的只有 118 公斤,少了 8 公斤的力气。其他各组也是只少不多。那么,这些力气跑到哪里去了呢?林格尔曼就此提出了他的“责任分散”理论:个体独立完成是全力以

赴,而群体中的个人是有所保留,希望由他人来多承担一份责任。

婚姻虽不是拔河,但也要考虑两人形成的合力是要大于结婚前的单体、要令两人的效用均有增加;这样,才会敲定结婚。可以说,这是这一经济共同体组成的基本原则。要考虑到,组成的这个家庭在今后所生产的产品要高于优于之前的单个独身,产品包括膳食质量、子女质量以及娱乐休闲、体质健康,还有爱情。还当注意一个现象:工资的提高和财产的增加,都会增强结婚的动机;当然,它也会增加离婚的动机。

办公室里的爱情故事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同一单位建立共同体的经济效益显著,尤其是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譬如,上下班可以共打一部的士,花一份钱是幸福了两个人;吃饭没有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苦恼,AB两套统吃。有一阵子,电视台的主持人与本单位同事山盟海誓的较多一点,还被誉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现在有年轻人试婚同居,进行磨合试运转,其中要磨合的一项内容,就是测定婚姻的收益:看合力的大小,责任的履行多少,景气指数的好坏。

“敲定”是充满激烈竞争的。

择偶的标准一旦确定,就开始进入找朋友阶段。实际上,就是进入一个竞争的市场。用贝克尔教授婚姻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理来说:“鉴于男性与女性在寻找配偶的过程中存在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市场的存在。在市场环境的限制下,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最佳的配偶。”

婚姻市场是存在的。有初级感受的,不是在男多女少的地方或者就是在女多男少的地方。用我们过去弄堂的民谣来表述,是“介许多萝卜夹了一块肉”或是“介许多肉夹了一块萝卜”,也就是萝卜与肉的比例失调。





近年来,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的一个显著反映是:上海结婚人群中的异地婚姻呈现出上升的势头。不单是外省人抢上海的小姑娘和男小人,同时也有不少的上海小姑娘和男小人把深情的目光投射到外省人身上。

据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统计,早在五年前,全市国内登记结婚的 92448 对中,上海人与外省人的异地婚姻是 25268 对。占到了总数的 27.72%,比 2001 年增长了 18.6%。而从 1990 年到 1995 年间,上海人与外省人踏上红地毯的,平均每年只有 5000 对。

有意思的是,嫁给上海男生的外省女生是远远多于讨上海老婆的外省男生,嫁过来的是 21241 个,讨上海老婆的只有 4387 人。但上海女生找外省男生的人数在增加,原来比例是 1:9,现在已变成 2:8。而且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女生都接近金边白领,有国家公务员、法官、大学教师等。

另外一个让我们看见寻偶竞争刀光剑影的地方,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约来相会有缘就拉手的电视谈“敲定”节目。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节目是在 1984 年,台里《国际瞭望》的编辑拿来一盘台湾电视节目;带子是 NTSC 制式,还要转换成 PAL/D 制式。那个节目叫做《我爱红娘》,录制现场在旧金山,背景是金门大桥。那一场是四凤求一凰。表身份,展口才,还要显厨艺。当时还看得新鲜,没想到十年之后,这样的节目就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红成一片。

尚未结婚的上海男生女生,你们可要加强竞争的力度,还有强度和高度。“敲定”是敲了才能定,用什么东西敲?瞎子吃馄饨,大家是心里有数。

“汤司令”，喝汤么

汤司令是何许人也？在上海说起他，是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指原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区总司令汤恩伯，他的公馆就在今天的多伦路。小时候，看了电影《战上海》汤司令出场的那个场景，我们也学着拔起嗓子喊：“汤司令到——热水瓶爆——癞蛤蟆跳——”

另一个汤司令则不是军人是老百姓，是因为天天在单位食堂吃汤而吃成了司令。他们吃汤不是为了餐前开胃，汤就是他们下饭的菜；吃饭不买菜，只要一分钱或者是免费的汤。上海人平时说起的“汤司令”，基本指的就是这样的司令，而不是汤恩伯。

这些长期喝汤、经常喝汤的“汤司令”，绝大部分是筹备结婚的小青年，主要是男青年。他们从牙缝里挤钱；向肚子要效益。为结婚所需的资金添砖加瓦。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汤司令”辈出的年代，那时的人们缺少生财之道，只靠一份死工资，没有活络铜钿。现在，致富的门路多了，食堂里

